

常青 著

逆水行舟

东京地产案

速度的诱惑

打过长江去

银幕外的王苹

五彩花和一个军医的故事

银勺上的珍珠

炮兵营长的世界

解放军出版社

NI SHIQUI XING ZHONG

祝福与期待

峭 岩

面对这喷鼻的墨香，面对这无声的语言——文字，面对这用心灵雕造的艺术圣殿，我是应该说点什么。说什么呢？我忽然想起一位文学大家说的一句话，一位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他应该为了实现文学的愿望，赴死而不悔。

她，常青，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一位独具特色的女性。

记不得最初是怎样认识的。她说是在文艺社举行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我曾鼓吹过她的一首长诗，她说是因为有了我的支持和肯定，那首叫作《青春绿色的旋律》的长诗才得以发表。此举她深深记在心里。十年后还由衷的谈起。其实，我们的认识还早，80年代初我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通过电话曾约她为一组《静静的病房》照片配文字，那时她在301医院工作，每天为打针、送药、换煤气罐等琐事所累。后来听说她到军艺文学系上学，又听说她调到八一厂编剧本去了……

再后来的日子，虽说都在一座城市，却如隔山隔海。1993年我

应出版社之约，编一本纪念军艺文学系第一届学员毕业十周年、命题为《梦想成真》的报告文学专辑，其中当然有写她的一篇，自此又有了她的音讯。文章是我的儿子李兵写的。他认真地采访了她。她对文学的执著、对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带来的婚姻辛酸，心灵创伤等等，深深打动了执笔者年轻的心灵。晚上，李兵回家向我简述了她的经历，是我始料不到的，惊异之外又有些理解和宽容。记忆并没打结，一晃又是两年，有消息说，她打了转业报告，到珠海当专业作家去了，我有些疑惑不解，淡淡的问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而消失。

去年11月，深圳举办的第七次全国书市上，我见到了她，红红的脸颊上洋溢着亢奋，身体胖了一圈，不似往年的杨柳细腰，反倒变成了篮球场上的“黑姑娘”了。几个小时的见面，她滔滔不绝地说起珠海，说起和珠海遥遥相望的澳门，说起好似外国语的广东话。尤其说起咖啡，她不吸烟了，换成了咖啡，简直相依为命，难割难舍。

她说，“我到珠海来，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写作环境，孩子大了，家庭嘛，无所谓。”她说得很轻巧，我却深深体悟到语言背后的沉重。

这时，我才顿悟，生活和文学的相互依赖，假如没有暴风雨的洗礼，瓦蓝瓦蓝的天空何以诞生！假如没有坎坷、屈辱、蹂躏、甚至死亡，悲壮的文学从何而写！

这时，我才触摸到一颗近似殉道者的灵魂，她酷爱文学，随时准备为她献身！有了这种境界，还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还有什么身外之物不可以舍弃的呢？

我们的对话是在十几层大楼的阳台上进行的。眼前便是灯红酒绿的世界，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当今时髦的大款、大腕、下海、经商之类的话题，对此，似乎她很感兴趣。我发现，很多人误解了她来珠海的目的，她确实是想在沿海闹区找到一方创作的净土，借以实现她文学的美梦。从她的精神面貌来看，她找到了，而且很顺心。就

在我们见面之前，她已接受了写澳门的任务，言谈里已有多把握。

她是个很讲义务的女性。她说，不好好写写，写不出像样的作品，就对不起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她又一次谈起收在《逆水行舟》集子中每一篇报告文学诞生的经过。

应该说，她对文学是严肃的。面对她近乎幼稚的神情，我又想起在《梦想成真》中的一段话：“写作对于她，不是选择而是命里注定，这是她与世界唯一对话的方式。”她以“自己是在用鲜血走路”这句话，说明自己对文学事业的真诚。的确，在那一摞稿件中，我们似乎看到深印着一双虔诚的脚印，从泥巴路上延伸到茫茫山野，又在狂风骤雨中，行进到苍穹的浩淼之间，她的心在那里遨游，留下一串串深沉雄健的歌声。她以一位女性独特的心境潜入到王莘的导演世界，探究到一颗“在痛苦中寻找希望，燃着希望的光给人们再造一个银幕世界”的坚韧的心；她用跨世纪眼光，扫瞄到一位炮兵营长，对他的玩具王国作了扑朔迷离的造访；她以女人的温情停留在科学家蔡翘夫妇的病床边，追忆大洋彼岸的挽留之情，剖析了一颗赤子报国之心，为我们留下了一缕温婉而美丽的诗情……

她就是这样和她所写的人和事，同甘苦共欢乐、溶为一体、心相印。她笔下的文字，都是她的心血和主人翁的心血汇流之后，再产生的激流，当它流过时，无不留下动人心魄的力量。

在此，我们不必争辩什么是报告文学，更不必过多地阐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或者文学性，或者新闻性，或者其它什么，我们只管看看她的文字，走进她的精神世界，尽管“她好像离人群很远，以至让我们不能真切地感到她的深度”，但在她沸腾的精神辐射之下，我们足可以感触到一颗坚韧的心灵了。

在展读她的文字时，我发现她有惊人的感情投入，也许这就是成功的报告文学之所以成功的理由之一吧。写进她的作品里的文字不是按记忆码起来的“积木”，而是画家手上的调色板，一点一滴总关情。在《银幕外的王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王莘隐忍痛失丈夫

的极大痛苦，投入《九九艳阳天》的拍摄，“家乡风光秀丽的大自然，以它特有的风姿医治着王苹心上的创伤，她和演员们一起插秧，一起车水，一起分析剧中人物的情感。一曲《九九艳阳天》唱遍了全国，可有谁知道，在那曲《九九艳阳天》里曾揉进了王苹多少思念和多少恋情。在家里，她称宋之的为哥哥。在外面，她尊他为师长。生活教给了她艺术，她把她的痛苦在艺术中得到了崭新的升华。”读她的报告文学我感觉不到生涩、牵强、苍白，而是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在流动，时缓时急，缓时如春风拂面，沁人肺腑，急时如大浪击岸，久久不能忘怀。她每篇作品都有一个切入的角度，而每一个角度都几乎是该人物的命运闪光点。写王苹不是从头写起，不是从王苹的诞生写起，而是从她最痛苦的事件——偶失丈夫的悲痛中切入，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写炮兵营长的切入角，更新鲜，她选择了一个“把国产玩具当成美国玩具”的误会事件，令人忍俊不止。她写科学家蔡翘夫妇，竟选择了老妇人在弥留之际的情节，给人一种悲壮后的轻松，或者凄婉后的美丽，表现出一位科学家夫人的默默奉献精神，从而得出爱情之崇高和女性之伟大的联想。

报告文学应当有文学。这在她来讲，简直轻如鸿羽。这也许是她的长项。作为诗人的她，早具有诗的表达素质，而且写得很出色。当她转向报告文学时，诗可以说又做了她的翅膀。我很为她在文章里的文学描述所感染。“收音机传来了俄罗斯著名的歌曲：《跳蚤之歌》。男演员诙谐的歌声，在教授楼的每一处角落里回荡。他禁不住微微一笑，把眼镜习惯地往上推了推，舒展开已经有点僵硬的胳膊，把一叠厚厚的书稿，轻轻的放在身旁的茶几上。然后，拧开钢笔帽，笔尖戳在一行字上，读了起来。”“阳光从树林的枝叶缝隙间，射进了一道道扇形的光线，森林里一片迷人的静寂。草地上黄色的、粉色的和各式各样的小花，似乎张开了惺忪的眼睛，在懒洋洋地打量着天空。”（《显微镜下的世界》）“一缕柔和的阳光，倾洒在寂静的房间。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儿子们，呆立在母亲的床旁。她那双曾经给孩子母爱、给过丈夫力量的眼睛，始终没有张开。呵，她去了。”

“她去了，就这样的去了。楼里，格外的安静，空间仿佛被拉大了，时间也显得特别长。此刻，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蔡翹，跌坐在铺着格子枕巾的沙发里，用烟卷吐着一圈又一圈的思绪……”（《科学家和他的妻子》）“我疑惑地打量着正在抽烟的他，眼前似乎浮现出他描绘的一切：村前闪着波光的小河，河里长满了水草，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在阳光下高高兴兴地洗澡。翩飞的蝴蝶，蹦跳的蚂蚱，五彩缤纷的野花……突然，在无边无际原野上飞起一只蓝色的鸟。那鸟儿愉快地扇着翅膀，像一个来不及停留的梦幻，转眼就在小开新的头上消逝得无影无踪。他看呆了，入迷了。他想起不久前自己看到过这种鸟是在画上，别人告诉他这是齐白石的作品。当时，他觉得这鸟简直画神了。可万万没想到这鸟就在自己村里，在自己眼前。”（《蓝鸟》）。

读了以上的文字，不难看出她出色的文学表达功底，是那么细腻清丽，又天衣无缝，与报告文学的属性相依相辅，尤如非洲的宝石镶嵌在欧洲的玉器上，至精至美。没有游离不适的感觉，大概要感谢诗的贡献了。

我想，她的报告文学正像她的诗和小说一样，已走出了坚实的一步，无论兵歌还是特区交响曲，无论士兵还是企业家，她都能对付，而且妙笔生辉。我以为这是与她对待文学的殉道精神是分不开的。文学需要一方净土。这时，我真理解了她们只身来珠海的意义，她们的确不是到繁华闹区捞金钱来的，更不是赶时髦为自己贴金来的，而是真正寻一方净土，死心踏地的干一番事业。

“我认为我没有错，珠海会欢迎我的。”她很平静地说着这些不深不浅的话，表现出超然和自信。设想两三年后，一部浸透心血的珠海交响诗定将诞生在她笔下。

她远在北京的爱人在期待着。

她相濡以沫的女儿在期待着。

我们的心灵也在期待……

1997年1月26日于京城甘家口

目 录

祝福与期待	峭 岩	[1]
-------------	-----	-------

东京地产业		[1]
速度的诱惑		[46]
科学家和他的妻子		[87]
打过长江去		[102]
蓝 鸟		[117]
畅游在新的海域		[132]
耸向云天的脊骨		[169]
显微镜下的世界		[183]
银幕外的王苹		[197]
五彩花和一个军医的故事		[208]
银勺上的珍珠		[220]
信念是滚烫的		[233]
光明使者		[246]
金学其人		[271]
炮兵营长的世界		[297]
笑的升华		[304]
逆水行舟		

东京地产案

1984年9月，被称为30年来世界上一场最大的遗产争夺战暂时拉上了帷幕。

10多年过去了，公民的利益在逐步得到保证，但中日两国律师在此案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令人无法忘怀。

亡 灵 之 谜

夕阳还不肯隐去，它转动着腥红的眸子在山坳里徘徊。

深秋，满清皇宫的院墙内。一株枯枝老干的玉兰树顶着一朵孤零零的玉兰花。金銮宝殿中，慈禧为这朵不合时令开放的“妖花”伤神。

不久前，日本向俄国宣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们争斗的战场不在日本海，不在西伯利亚，却在中国的国土上。大连和旅顺被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抢占了，这株多年枯败的玉兰树却开出这么一朵大白花！是福是祸？兆吉兆凶？老慈禧煞费苦心地冥想着，她被这朵“妖花”搅入了迷阵。

夜很深了，庭院的角落里终于平添了一座花冢。

雪白的玉兰花被剥得粉碎葬在了皇宫深院的幽暗处。

埋葬了妖花，慈禧的心似乎平安了，但皇宫仍在战事中颤抖。

宫廷中，上至皇帝下到仆役都在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

一个丫环在大街上疾走。她白衣素裙，黑黑的头发盘成蝴蝶髻。

那也是深秋，年轻的赵欣伯坐在一个寒伧的木凳上画画。

丫环停在赵欣伯身后，秋日的风在她和他之间冷嗖嗖地穿过，他感到冷，她也感到冷。他俩靠近了——

“您可真有闲心！”她轻轻地笑起来，他画板上显现出一个个在秋风中疾走的形体。

他抬起头，姑娘那双目光流盼的眼睛使他耳红心颤。他怯怯地请求着：“小姐，我能给您画张像吗？”

姑娘什么也没说，她顺从地摆好了姿势，坐在赵欣伯面前——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震碎了皇帝的宝座，满清王朝上下一片混乱。就在赵连魁大骂儿子不仁不孝，赵牛氏眼泪汪汪不知儿子去向时，赵欣伯已和那位王府的丫环私逃大连，直奔日本东京去了。

1920年的东京。

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的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她就是那个满清王府的丫环王碧琰。

炎热的东京在各种喧嚣中显得嘈杂纷乱，王碧琰面无血色，她的腹部有一道刚刚缝合的伤口。

医生走进来，他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束手无策。

各种监护仪正在嘀嘀嗒嗒地响，王碧琰的视野中却是一片苍白——

日本，这是王碧琰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她曾受命于满清政府来专门学习各种宫廷礼仪，她熟识这儿的风土人情，熟悉这儿的生活习俗。又是在这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她的丈夫在她的帮助下完成了明治大学法律系的学习，成为日本陆军学校的一名教官……还是在这里，她有着许多甜蜜的梦想……她不愿这样快地就撒手而去……不愿！

王碧琰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屋顶，她知道死离她很近了……

墙上的挂钟敲了5下，王碧琰的眼眉抖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她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个当年的王府丫环，这个美丽的王碧琰吃力地挪动着自己的手臂，不知是想抬起来还是要支撑着坐起来……一切归咎无效，她的手臂痉挛着抽搐了一阵终于跌在床上——

这是个炎热的夏季。

夏季令人遐想。

可是美丽的王碧琰与遐想无缘了。

56年后的东京家庭裁判所，一位叫赵碧琰的老妇人站在东京裁判所法庭上。

她身材矮小，目光凄切，一张憔悴的脸还依稀透露着昔日的美貌。

法官问：“你叫赵碧琰？”

老妇人点点头，苍老的面孔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请出示你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回答。”法官对老妇人期待着。

老妇人哆哆嗦嗦地打开一个布包，取出一叠又一叠盖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红戳的证明材料。

法官歪着头把这些材料看了很久，他失望地摇摇头。

“你就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你是东京财产的产权人吗？”说罢，他把这些盖着大红印章的材料夹在了硬纸夹里。“夫人，这很令人遗憾。”说罢，退下了法庭。

老妇人凄凄惶惶地走出法庭，她不明白自己祖国的印章怎么在异国他乡失去了效用？老妪苍白的头颅抖颤着，混浊的眼窝里溢出了两颗泪——她冤枉！

赵碧琰死了！

赵碧琰没有死！

赵碧琰是东京巨产唯一合法的产权人！

赵碧琰不是！

随着老妇在东京法庭的败诉，一连串肯定与否定的疑问罩在东京大笔数目可观的巨产上。

素有寸土寸金之称的东京地皮，是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地皮，曾有这样的估价：如果在太空建造一座宇宙城，那也会比在东京买一块地皮便宜得多。

瞬间，赵氏地产成了东京上空的一个谜。为什么一个中国女人会在东京拥有这批地产？这个女人究竟是亡灵还是活人？她是不是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如果是，为什么拖延到现在才来认领？一个个问号触动着记者们的神经，也膨胀着各国骗子的金钱梦。

香港的赵碧琰走上法庭……

澳门的王碧琰到日本查证身份……

赵辰、赵诚、赵雪男、赵国章等赵氏后裔纷纷从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冒出……

70年代末的一个夜晚，一位年轻的播音小姐闯进了东京家庭裁判所的大门。她新近才觅得一处住所，可是搬进新居的第二天，楼的四周竟被人掘出一道深沟，她无法出入，请求家庭裁判所给予法律保护——

一位居住在国领町的住户向警察署请求保护。在赵氏遗留的地皮上，他常常半夜接到无名氏的电话，他要求警方维护国民的生活安宁——

这时，一幅漫画出现在东京报纸上——一卷巨舌，龙涎三尺，上面攀附着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自称是赵氏的遗孀，后代，分别叫赵辰、赵诚、赵雪男、赵国章……

《日本邮报》惊呼：“亡灵在行走，黑绅士们麇集！”

文中写道：“在这个狭窄的日本，还有旧满帝高官夫人名下的土地两万数千平方米至今不知其所有者的去向和生死，悬而未决。时价约五十亿日元。”

围绕这片土地，自称“我就是继承人”的人们不断涌现，现已有

十数人之多。仅是这些已足以令人头痛，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人自称他们从去向不明的所有者，自称是所有者的代理人手中买了土地或借了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40年，但围绕这片土地的争执还未停止。受理登记的东京法务官以厌倦的神情肯定说：“不管今后5年，还是10年，都不会看出这个问题有何清晰的前景。”

1976年3月10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飘浮在宇宙的二百四十亿》的文章，透露赵碧琰名下的财产被人骗取。

同年6月，日本《新闻周刊》发表文章，题为《围绕两兆日元跳跃的骗子》，文中继续报道赵碧琰财产被骗情况。

《澳门日报》、香港《大公报》和《明报》都对赵氏地产案作过轰动一时的报道。

1980年11月，《明报》和《东京新闻》等报刊，继续披露赵碧琰财产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骗子冒领的可能。

确实，在东京裁判所这样的地方，完备的手续和文件关系有时会优先于事实关系，如果原告或被告申通证人以法庭为舞台合谋演戏，尤其是遇有精于此道的歹人，案子便会按他们预期的方向顺利进展，最终使骗子们如愿以偿。

多情好事的记者们凝注着纷至沓来的“亡灵”，发出一次又一次的惊叹：“亡灵活着！”“亡灵在澳门！”“在马来西亚！”“在北京！”“在台湾！”“在香港！”亡灵在到处行走——那么，这个产权人究竟是“亡灵”还是“真人”呢？

记者们找到由东京家庭裁判所指定为这些土地的管理人——山本忠义律师，请求他透露更多的细节，被山本忠义律师婉拒。

接着，东京各裁判所围绕赵氏名下的地产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现象——

住在东京台东区的一位妇女上诉，她自称是赵碧琰财产的继承人。

她说：“战前，我从赵碧琰手中买了调布市飞田给的土地，产权人应立刻承认这一点。”她的虚构竟得到了东京某裁判所的认可。

自称是合法继承人的赵国章，声称是赵氏子裔。他手持台湾当局发放的户籍誊本，华侨身份证明信、印鉴证明书等等，去迷惑东京地区的法官。裁判所看过赵国章携带的证明材料，又认为“此人最迫近事实”，他们采取了“公示通达”的方式进行裁决——这是一种非常的审理程序，就是只根据证件齐备情况实行“缺席裁决”。

就在赵国章三番五次地申请“财产权转移登记”时，又突然冒出了一个 M 氏。

M 氏揭露赵国章是赵碧琰的假后裔，她拿出更齐备的文件，证明她才是“亡灵”的真正后裔。她说赵碧琰已死于医院，她就是赵碧琰之女，只有她才是赵氏财产唯一合法的继承者。

接着，M 氏也申请“财产转移登记手续”，并要求大阪裁判所出面裁决。

因为 M 氏的手续更加完备，赵国章只好哑言退出，让位于 M 氏。

于是，一家简易裁判所便作出承认 M 氏申诉的判决。

M 氏立即拿着这家简易裁判所的判决书向东京法务局提出“财产转移登记”申请——东京法务局已接待了不少“亡灵”和“亡灵后裔”，法务局研究后决定：“此判决一定要深入到再也不会其他继承人出现时为止。”因而压住了 M 氏的登记申请。

与此同时，赵碧琰名下的土地开始被人相继卖掉——

1977 年 3 月，箱根仙石原的土地被卖掉约三百坪。

1982 年 11 月，国领町的地皮约两千五百五十平方米几乎全部被卖。

1983 年 1 月，飞田给的土地又被人卖掉。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从山本忠义律师手里买到土地的府中市 A 氏，在 4 个月后将其转卖给住在飞田给的 B 氏，土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转买转卖，日本称之为“滚土地”，而买得土地的 B 氏，则又利用手中的土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诈骗。

有趣的是，当日本警视厅前去惩治非法进行转买转卖土地的

B氏时，B氏竟理直气壮地说，他是赵碧琰财产真正的合法继承者，有权对这些土地买卖。

真是咄咄怪事！明明只有一个产权人，却冒出如此众多的“产权人”和“产权人后裔”！

日本的法官先生们面临着良心和智能的考验。

她不是亡灵是真人

被日本报刊称作“亡灵”的产权人确实活着，她就是走上了法庭，又被迫退庭的赵碧琰，她当时年近90，住在中国北京的一个单元楼里。

1943年，介于中国国内的形势，曾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赵欣伯在日本东京购置了许多地皮，并将一个沉重的保险柜深藏于日本成城町私宅的地穴，这个保险柜里装满了钻石、翡翠、金条、珍珠等财宝。在他回国之际，赵欣伯将这些在赵碧琰名下的财产委托给一个名叫铃木弥之助的人代为照管。1963年，一个姓马的华侨偷卖了赵碧琰名下的一块地皮被东京警视厅发现，并且扣押了马的妻子，马某救人心切，向东京华侨总会求援，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甫文、陈煜旺二位先生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当时主持中央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副主任。经过核查，这才发现了中国公民赵碧琰名下的地产，廖承志副主任这才知道在“寸土寸金”的日本，还有中国人名下的地皮数万平方米。

在一个狭小的胡同里，中国共产党中央侨办的同志终于找到了这位伪满洲国高级官员的遗孀。赵碧琰听到自己的地产被人倒卖，十分焦急。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60年代之后的中国无暇顾及这笔理应归还中国人的财产，事情发生了一系列逆转。赵欣伯死后，铃木弥之助立即否认北京的赵碧琰是赵欣伯之妻，赵欣伯当年藏于地穴中的金银珠宝曾一度由盟军总司令部接管，后来又作为战胜国人民的财产交由日本银行保管。日美媾和条约签署后，这笔

财宝又被交给日本大藏省。再以后，这笔财宝便不知去向，而赵欣伯在箱根的别墅、调布市和狛江市的耕地及住宅用地，却统统落入了铃木弥之助之手。

1973年，铃木弥之助故去，赵碧琰再一次请求东京法庭重新审理此案，并确认她产权人的身份。

1973年的中国，仍然处在动荡和不宁中。同年5月4日，恰是54年前中国人“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纪念日。76岁的赵碧琰再赴东京，她随身携带着各种身份证明信，每一页证明信上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处的大红印章。在中国境内，鲜红的公章是神圣权威的，可是在日本法庭上，法官对它的效能表示了迟疑。

法官阅完证明材料，请证人板垣喜久子出庭。

这位侵华战犯的遗孀在板垣征四郎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后，一直和儿子居住在东京。

两年前的，赵碧琰曾专门拜访过喜久子，她记得喜久子坐在沙发上，生活得还不错，只是耳聋眼花，看上去已没了年轻时的风采。

“你——还好吗？”赵碧琰伸出手。

喜久子一双干瘪的手在赵碧琰的手背上抚摸了好久，好久才颤巍巍地问：“你也好？你儿子好吗？他眼睛治好了没有？在哪里做事？”

赵碧琰说：“我还好，只是儿子的眼睛治不好了，他现在在民政局工作，快当公公了。”

两位被战争遗弃的老妪静静地对坐着，她们曾享尽战乱时的富贵荣华，也曾经历了和平时期间沧桑。

“喜久子，”法官指着赵碧琰问，“你认识这位夫人吗？”

喜久子的目光奇怪地躲闪着，噤着嘴。

“那么，夫人你认识她吗？”法官问赵碧琰。

赵碧琰回答：“认识。”

“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哪种场合？你见过这位夫人？”法官提问。

时间？地点？场合？赵碧琰思索着，追忆着，脑中出现一幅画面——

1943年她随丈夫去东京清理财产途经汉城，那时的板垣征四郎是日军驻朝鲜部队的总司令官，在一次宴会上……对，就是那个宴会！她记起一个娇艳的日本女人倚在板垣肩上，一口接一口地把玻璃杯里的酒倒进板垣嘴里……

没等赵碧琰说完，早激怒了证人席上的喜久子。

“法官先生！”喜久子抬起那张扭曲的脸嚷着，“1943年我一直呆在东京，根本没去过汉城！”

没去过？这怎么可能？赵碧琰惊呆了。直到若干年以后，她方才记起，那个偎在板垣身上的女人确实不是喜久子，是一个军妓，确实是一个军妓，她却误以为是喜久子！她毕竟老了，记忆出了毛病，可这是个多么可悲的毛病啊！她失去了第一个证人。

接着出庭的是一个短胖的中年妇女。

那位中年妇女只瞥了赵碧琰一眼便迅速低下了头。

“赵碧琰，”法官指着中年妇女问。“这位夫人主动要求出庭作证，她说在结婚前曾在你家作过下女，你能和她对证吗？”

“夫人，”法官的话音刚落，那女人倏地转过身，一字一顿地问道：“夫人，还认识我吗？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吗？”

这咄咄逼人的问话使赵碧琰懵了，她努力回忆着……1935年侨居日本时，当时仆役成群，还不时更换，高贵的主人怎能把一个极普通女佣的名字牢记30余载呢？她实在记不起来了，摇了摇头。

“马场初子，”法官问，“你说你婚前为学习礼仪曾到赵家当过下女，你看这位夫人像不像赵欣伯的夫人？你能否为法庭提供一些依据？”

马场初子确是在结婚前到赵家的，可仅干了一两个月，她同赵家的关系应该说非同一般，尤其是她和赵家公子的交往绝非一般，她也绝不会忘记。

马场初子的住宅就建在赵碧琰名下的地皮上，如果确认了赵

夫人，她的住宅便是非法建筑，结局不是交出就是付钱，那将是一笔巨款，肯定落得倾家荡产。如果无法确认赵夫人，这块无主的地皮过若干年后也许就不会令她劳神费心了，这应该是天赐的良机

马场初子抬起头，她已拿定主意，果断地说：“我看不像赵欣伯的夫人，在我印象中，赵夫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法官，我听说赵夫人死了，死在医院里，我不认识这位夫人。”

不认识？就因为叫不出马场初子的名字吗？赵碧琰如雷轰顶，这怎么可能？她木讷地看着马场初子旁若无人地从她面前走过，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夫人，”法官换个问题，“你的丈夫曾分别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逮捕过，请问各是什么时候？关押何处？死于何处？死因是什么？请你叙述一遍。”

“1945年12月，他被国民党抓捕。1952年……”一个身着锦缎旗袍的女人搂着龇牙咧嘴的骷髅笑着向她扑来，是谁？是小凤吗？她细看那女人却正是自己！赵碧琰说不下去了。

“说，说下去。”法官催促她。

她说不下去了，她不愿意回忆，她害怕回忆……

1966年，她站在家属院的空地上，脸被王碧琰的那个侄媳妇刮出无数脆响！至今看到别人扇嘴巴，她脸上还会感到火辣辣的痛。

“夫人，你既然回答不出法庭刚才提出的那几个问题，那么你能否回答下列问题——”法官拿出一页纸，眼睛在上面停留片刻，“我要问的是你在町库的保险柜中，放了多少块手表？它们的形状如何？什么牌子请你回答。”

赵碧琰更答不上来了，当初埋藏这批珍宝时赵欣伯并没让她参加，也没给过她清单，况且76岁的老人怎能将33年前的细节记得那么真切呢？

“再想想，夫人！”法官提醒她，“想想还有什么古玩？”